

编者按: 2009 年是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 严中平先生和李文治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0 月 17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经济史学会举办了“纪念严中平先生、李文治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太昌研究员和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研究员分别主持。中国社科院和经济研究所的领导、严中平先生和李文治先生的亲属、以及来自京内外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汪敬虞、宓汝成、林甘泉、宁可、张卓元、刘克祥、李根蟠、陈廷煊、陈支平、刘志伟、虞和平、朱荫贵、王玉茹、刘建生、苏少之、陈争平、慈鸿飞、管汉晖、李明、梁承邨等先生发了言。与会学者缅怀了严中平先生和李文治先生的高尚节操和严谨学风, 回顾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卓越贡献。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山西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学者还介绍了其经济史学研究现状。为了纪念严中平先生和李文治先生, 也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 本刊特登录经君健、江太新、董志凯先生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以飨读者。

鲜明的立场 严谨的学风 ——严中平、李文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经君健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严中平先生和李文治先生两位都是我的老师, 入行的引路人。我是 1954 年到经济所经济史组的, 得到他们 40 多年的教诲和熏陶, 受益之深, 难以言述。今天能参加他们的百年诞辰纪念会, 甚感荣幸。大会给我机会表达对他们二位的缅怀之情, 谨此致谢。

我虽然受教于两位先生 40 余载, 但至今并不具备全面评价他们的学术成就的能力, 惭愧之至。下面仅重复严先生的某些观点, 体现我对他的点滴认识。

严中平先生为经济史学奉献了一生, 写出了传世的精品, 更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 1950 年回国以后, 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学科的领导工作。在这个岗位上, 竭尽全力。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①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研究重镇, 近半个世纪以来, 一大批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学的专家在这里集中、成长, 高水平的学术论著迭出。就学科而言, 他领导制订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 12 年科学规划, 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牵头成立了“中国经济史学会”, 搭建了全国的学术交流平台。20 余年来, 这个平台一直正常地为广大经济史工作者服务。他主持创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 为广大经济史工作者提供了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园地, 已成重要学术刊物之一。他撰写多篇文章强调经济史学科的重要性, 在各种会议上为重视这个学科的发展而呼吁, 使上世纪 50 年代不甚为史学界和经济学界重视的状态大有改观, 博得更多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注意, 吸引了更多学子投身经济史学科。这些工作都起到了推动经济史学发展的良好作用, 为这个学科达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经济史学科而言, 严中平先生居于重要的奠基人和带头人的地位, 筚路蓝缕, 其功至伟。

一、一位爱国主义的史学家

严中平先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他的论著充满爱国主义思想。他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特别强调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华民族经济带来的灾难。他认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根本目的是从经济上榨取中国

^① 经济研究所后随上级单位改变而隶属“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组以后改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以及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室、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

人民的血汗,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这个基本观点在他第一本代表作《中国棉业之发展》中就已确立:“开关后的中国,先为列强商品的宣泄市场,后为列强资本的投放场所,故近百年中国经济史的演化,实为一部中国经济沉沦史。”^①以后他写了多篇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的文章,例如《论江宁条约与中外通商》、《“浮动地狱”里的滔天罪行》、《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②等等。他的反帝思想在后期更加突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历史评价问题还需要讨论》^③是他的遗稿,仍是反帝问题,对“开关好事”论展开了论战。

严中平强调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单纯用经济规律解释经济现象不能得到充分说明,必须看到政治暴力的作用,政治暴力本身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种经济力量。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政治大倒退。第一次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为一个不完全独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对中国进行间接政治统治;第二次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帝国主义操纵下,把一个统一的国家变成为军阀割据的混乱天下。中国经济就是在这两次政治大倒退的形势之下发展变化着。根据这一总的线索,他把1840—1894年这段经济史,以19世纪70年代初叶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西方入侵者凭借条约权利、政治声势和炮舰威力对中国人民进行了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这种暴力掠夺具有为所欲为的随意性和伤天害理的残酷性。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性质的间接政治统治,其经济侵略具有暴力掠夺性。后一阶段帝国主义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对中国的侵略更多地采取了经济手段。在70至90年代,帝国主义是通过攫夺中国进出口商品市场的领导地位进行的。他们把势力深入到交通运输、保险、仓库、商品购销和金融周转等各个方面,培养了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形成一套买办资本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形成一整套控制商品流通渠道的完整体系。条条渠道都汇集到通商口岸去由他们操纵领导。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入资本输出阶段,他们的势力就在继续掌握中国进出口商品市场领导地位的同时,更深入到中国的生产和财政领域,全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了。^④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⑤一书贯彻了两次大倒退的观点。

严先生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这些论点,使之逐步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他看到那些否认帝国主义侵华、美化殖民主义、否定民族英雄、颂扬民族败类的论调的时候,总是义愤填膺。在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问题的讨论中,严先生放弃原来自己提出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提法,而强调重视政治军事暴力对中国经济强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反作用,其原因除去由于他对所掌握的资料有了新的看法而外,窃以为也是他的爱国主义情结强化的结果。

严先生不仅在研究侵华问题时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而且在研究工作中同情和支持所有受侵略、受压迫和受剥削国家和民族,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均持批判态度。他研究西班牙美洲殖民帝国、菲律宾殖民帝国和葡萄牙东方殖民帝国的早期征服史时,对老殖民主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无情地揭露一切西方殖民主义海盗冒险家的侵略行径。他收集了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写出《老殖民主义史话选》一书,揭露老殖民主义在美、亚、非三洲令人发指地杀戮以数千万计的无辜土著居民的累累罪行,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彻底批判。他坚决反对主张殖民主义给亚、非、拉人民带来资本主义新事物而应予以歌颂的观点,认为殖民主义行径的那种后果只能像马克思评价英国人在印度的作为那样,称之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⑥

① 第一章导言,商务印书馆(重庆)1943年版,第3页。

② 均见《严中平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 见《文集》,第319—330页。

④ 本节内容主要来自《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⑥ 本节内容主要来自《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严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很值得我们敬重。学术上的理性认识,直接指导了行动。严先生在英国进修时,正值全国解放,他欢欣鼓舞,毅然回归摆脱了半殖民地统治的新中国。并且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无情地批判一切对祖国不利的言行和任何人的媚外态度。严先生是一位大义凛然的、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面前绝无软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一位坚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严先生进行学术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上世纪50年代初,他为了研究鸦片战争问题,将多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译为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中译本每出一册,他都认真阅读,并将有关经济史的论述精粹摘抄、汇编,除供自己索引、备忘,还提供给经济史组的同事们参考。严先生如此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同时,他又谆谆教导青年独立思考,切记“不唯书”。他认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会将科学研究逼上窒息之路。他曾对章有义先生和我谈及当时苏联某些学者流行的以斯大林语录堆砌起来的文章,说:“这也叫学术研究?”他说,对历史研究来说,需要联系的实际就是确凿的史料。

严先生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多种著作的发展过程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在不断完善他们的学说。他把马、恩自己补充和修改的内容归纳为5个方面:第一、补充和修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某些失误;第二、吸收他人新成果;第三、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用客观实际去检验、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论点;第四、对那些在理论原则的抽象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东西,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实践上已经无益,就公开宣布其为“已经过时了”;第五、对修辞、注释、完整性、通俗性等方面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征引文献校核后的更正。对此,严先生的结论是,中国的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存在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材料,是我们中国学人大显身手的领域。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观点的基本点,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治学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峰吧。”^①

严先生用确凿的史料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某些错误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不懂中文,有关中国的知识,主要取自英国议会的辩论记录、蓝皮书和传教士、商人的著作以及当时欧洲报刊上的消息和评论。这些,基本上都是站在殖民主义者立场上说话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却能站在被侵略者的中国人的立场上,以极其愤慨的心情揭露西方殖民主义海盗冒险家对中国的侵略罪行。例如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②一文中,马克思就把17世纪末叶以后清廷“排外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归之于外国人的行径。严先生称赞说,“马克思从一片诬蔑中国声中,敏锐地观察到历史的部分实质,显示了这位大师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天才闪光。”^③

但是,马克思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受到了这类资料的某些影响。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又说,“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境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④,到清王朝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就“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境外,”从而实行了“野蛮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闭关自守”政策。对此,严先生明确地表示,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他举出英国的官方调查资料、鸦片贩子叫嚣的资料以及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和历史实际全不相符。

严先生认为,关于在中国贸易不自由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以抵补贸易逆差,所以鸦片贩子与各类资本家群起鼓噪,一致叫喊中国仇外排外,贸易不自

① 《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以下简称《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第2—7页。

③ 《十讲》,第172页。

④ 《十讲》,第171页。

由。这种舆论的目的在于酝酿侵略战争。鸦片贩子叫嚣对中国人“用说理以外的辩论加以教训”^①，1839 年林则徐采取严厉措施，绝对不给鸦片走私以“贸易自由”，于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便按照鸦片贩子所建议的政略战略发动了鸦片战争。

严先生指出，中国人酷爱和平，地理上的艰难险阻并未隔断中国的对外交往。丝绸之路自汉以后绵延达几百年之久，对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友好往来也历时好几百年。中国自古是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外国人来华流寓各地者众多，且都受到优待，其中在中国做高官者也颇不乏人。外来的不同宗教的犹太人能够融入中国，有力地说明中国没有仇视外人。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由于“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而排外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王朝对外政策的变化，是从明朝初年开始的。外来海盗和海盗式商人的非法行动引起明清政府采取严格的对外监督和海防政策。洪武初年，因倭患严重而设市舶司制度，其目的在于杜绝海盗。洪武后期，朱元璋下令严禁私下通蕃。中外关系史上的这两次变化，都是为了防止外侵而采取的国防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不是出于“仇视外国人”而实行“闭关自守”政策。

清王朝建立初期的确实行过严厉的迁海政策，但那是针对占据台湾进行反清斗争的郑成功的，与排外无关。康熙帝不仅容留外国教士在华居留，还重用他们。统一台湾以后的第二年，就开四口通商。可见，康熙帝不但没有仇视外国人，也没有“闭关自守”，倒是很重视海上贸易。

乾隆帝限在广州一个口岸进行贸易。两广当局又多次订立规章，限制外商非法行动，防范越来越严。这就是当时英国舆论指责“中国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境外”的“闭关自守”政策的主要内容。其实这只是限制外商的非法行径，是从巩固海防的角度出发的管理和防范措施，根本不是仇视外国人，或是闭关自守。外国人只要在中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贸易，就受到保护和优待。世界上没有一个主权国家能够容忍外国船只随意闯入它的一切港口，或放任外国人在自己境内乱说乱动。

严先生得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我们不承认在历史上中国封建政府，曾经实行过什么‘闭关自守’政策，更不承认，中国曾经出于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对外实行过‘野蛮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闭关自守’政策。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一个失误。”^②

所谓明清“闭关自守”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有不同看法的，学术界也一直在讨论着。但是把“闭关自守”归结为“地理上的”、“人种上的”原因，肯定错了。因为这种认识的结果是把它看成中国人所固有的，从来就有的，不可改变的了。这显然没有根据，与事实不符。绝不能因为这话是马克思说的就肯定是对的。严先生指出马克思的这一失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对待马克思主义著作，既要承认其真理性，又要通过史实加以检验。

在研究工作中坚持论从史出，要相信确凿史料得出的结论。对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工作者来说，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与时俱进。在发现新史料的情况下，在产生新情况的条件下，必须做出新的判断与决策。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应该确认，所谓“凡是”的提法对任何人都不适用，因为任何人都不是神。“句句是真理”的盲目崇拜也对任何人都不可用，因为一则人无完人，二则未来难测。

三、一位严格遵循科学规律的严谨的史学家

严中平先生治学风十分严谨。他强调搞学术研究先要下硬工夫收集资料，继而客观地分析资料，绝对不可断章取义，夸大缩小，更不可篡改文献，颠倒黑白，弄虚作假。

他认为把研究建立在大量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是谨严学风的最起码条件。主张充分占有扎

① 《广州纪事和行情报》，1831 年第 2 号。

② 本节内容主要来自《十讲》。

实的材料,对中外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刻的对比研究,以达到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反对捡拾零星材料去填充理论框架。他批评轻视资料的倾向,指出以为收集和整理资料是资料员所干的“下手活”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提倡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工作程序。这种研究程序,已成为他所领导的研究集体的共同财富和传统学风。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教学资料缺乏的状况,他组织经济所的同志先编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接着编辑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经过数年努力,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航运、和外债等资料。尽管这套资料丛刊还称不上门类齐全,也还有其不足之处,但在当时它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为教师们编写教材提供了资料,为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线索,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了基础国情资料。它为大家节省了很多宝贵时间,初步解决近代经济史方面的“资料荒”问题,对教学与研究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成为经济史学,乃至历史学、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案头必备。更重要的是这套资料丛刊的出版也提倡了重视资料的踏实严谨的学风。直到现在,这套资料丛刊仍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而它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为编辑这套丛刊,严先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56年,他写了《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①一文,是这套资料全体编者的经验结晶,为后人编辑经济史资料提供了丰富的具体经验。

严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次组织经济史组多数成员较大规模地外出蒐集资料:一次是以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为中心,一次以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中心,均有重要收获。此外,他于60年代初向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姜君辰主任吁请重视整理编辑清代“巴县档案”,并派我去四川大学与徐中舒先生联系这项工作。他曾派章有义和许钧两位先生赴陕西三原县调研,建议整理长盛和商店账册资料。他还组织经济研究所入藏安徽屯溪资料。他督促和指导经济所图书馆妥善保存上世纪30年代入藏的清宫钞档资料以及其他珍贵资料等等。总之,他对经济史资料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的推动和支持是不遗余力的。

年轻同志到所后都想尽快出成果。严先生经常提醒年轻人打好基础,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功近利。他一再强调,成果要禁得住“摔打”,禁得起时间考验,一大堆水稀稀的东西不如一篇“掉在地上当当响”的“干货”。为此,必须下苦工夫。我刚到经济史组时,严先生没有让我立刻投入研究工作,把我安排到图书馆。于是我在宗井滔馆长领导下,在汪熙曾等同志的指导下,穿梭于排排书架之间,从打扫卫生做起,做过了图书上架、整理、写标签、出纳、采购、手抄中文目录卡、打印外文目录卡,直到进行图书分类等馆员应该掌握的全套业务。开始接受这一分派时,我并不理解,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干了8个月调回组内,感觉大不一样。正是通过这些“打杂”的工作,我浏览了大量图书杂志,使我获得了基本的目录学知识,熟悉了馆藏的全貌,对当时经济所的藏书了然于心。这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来说受益无穷。严先生对年轻人的治学要求是严格的,有效的。

严先生对我说,不要把自己当作能倚马千言一挥而就的“才子”。常人之资也能写出好文章,那就是要下工夫精雕细琢地“改”。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严先生自己的稿子总是一改再改。他不耻下问,写出文稿有时先给大家看,要求提意见,并多次修改。他披阅大家的稿件也十分认真,会提出从理论到修辞的各种问题、意见和修改建议,既有原则的指导,也有具体的帮助,十分认真、严格。经济史组许多同志的作品都渗透了严先生的心血。在他的带动下,当时经济史组有个好传统,个人写的文章在定稿前请一位乃至多位同志审阅。后学们在这个环境中受益良多。

严先生于1986年发表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系统地探讨了研究方法问题。这本书中的若干篇章本是60年代初应《红旗》杂志之约而写的,后来加以扩充,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生上课的讲稿。该书讲(下转第17页)

① 《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

真理贡献卓越》，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6 页）。

可以告慰先师的是，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史学科的地位比此前有所提高。在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学术资料的挖掘与整理取得新的进展。如北大经济学院历经多年整理的《清实录》手工业商业卷、财政卷资料约 260 万字已交出版社即将付梓；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大型经济档案资料已经出版了 21 卷近 2 000 万字，另外 1958—196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十卷，总计 1 500 万字将于明年年初出版；南开大学的《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经 40 寒暑的努力已正式出版；《中华大典·工业典》3 500 万字、《农业典》4 500 万字重新编排已建立数据库等等。其他经济史数据库也已经或正在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正在呈现几个转折：其一，经济史研究从不被重视到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其二，中国经济史研究正在从一般的国民经济史层面向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及其相互结合转变；其三，研究视角逐渐由小变大，由断代向通史发展；其四，新一代经济史学者在成长，他们崭露头角、继往开来、迅速成长；其五，国际交流与比较研究有新的进展。这些转变源于社会宏观环境的转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建立到完善，多元化观念的形成，以及中外信息的沟通 and 交流渠道的形成等等。

尽管如此，这些转折仅是开始，在经济学界，经济史边缘化的状况还没有得到完全扭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家投入主要精力研究现实问题，而对历史上经济问题的研究却相形见绌。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西方经济学的成果，而对经济史的材料，经济历史的了解却相形见绌。在经济史学界，还有许多领域有待研究，特别是有待新的如椽大作呈现与问世。

严中平、李文治等学术大师和先驱们所期盼的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新局面，有待于我们共同努力创造！

（上接第 7 页）

述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研究的规范性程序和方法，告诉学生如何选择研究题目、如何分析研究、分别论述了核校前人论据、积累文献资料、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学风等等问题。他强调，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不能“炒剩饭”。近代经济史的科研工作者想有所创新，就要破四“就”、立四“新”。所谓破四“就”即必须对外国经济史有一定了解，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必须对古代史有一定了解，不能就近代论近代；必须对政治史有一定了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必须重视理论上的提高，不能就事论事。所谓立四“新”，即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或者新的研究方法。所写文章至少要占其一，否则就称不上是有所提高。在这本书中，严先生举了很多例证，从具体操作方法直到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一详解，并提高到认识论上来进行分析。这是他 50 年研究经验之谈，其中甚至包括经济史组这个研究集体的许多经验。这本书很少抽象的理论，更多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性极强的具体方法，它不仅能将科研新手领进门槛，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严谨的学风。其参考价值显然大大超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围。

学习前辈学者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树立严谨的学风，对于清除弥漫于学术研究领域的浮躁之气是多么必要啊。

以上三点体会，藉以缅怀严中平先生。